

史料与史学

翦伯赞



史料与史学

翦伯赞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史料与史学

翦伯赞 著

责任编辑：何瑞田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大学校内)

北京朝阳区京辉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130千字

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1209.37 定价：平装本，1.20元
精装本：2.30元

增 订 本 序

翦伯赞同志的《史料与史学》原本是一九四六年四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的，共收《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》、《论司马迁的历史学》和《论刘知几的历史学》三篇文章。

翦老自踏入史学战线，就很重视“史科学”，而且对这门学问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。只是从那时起，他的研究工作一直以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需要为主，因之对“史科学”的研究工作未能展开，亦无暇撰写与之有关的重型论著。一九四五年春，迁校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邀请翦老前往做学术讲演。邀请信说：

“敝院为增进学生研究兴趣，特设学术讲席。

夙仰

台端史学权威，著作等身。敢乞于本学期内
莅临主讲一次，藉饜群望。”

这年五月，翦老在该校以《史料与历史科学》为题，第一次比较全面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“史科学”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。

在讲演之后，书店即约请翦老以讲演稿为基础，“写一本关于史科学方面的小册子。”翦老原计划将讲演稿整理为三篇文章。在第一篇整理出来之后不久，即逢抗日战争胜利，政局在急剧发生变化，翦老的写作计划受到严重影响，原拟整理的第二、三两篇不得不中辍。所以在次年出版的本书，只收了由讲演稿整理而成的第一篇。不过，翦老在此文的题后，还是以“按语”的形式，许下了一个心愿：我“把这次的讲演稿加以整理，计有三篇，一、《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》，二、《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》，三、《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》。现在我只写成

《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》一篇，其余两篇，假如我的生活不发生变动，也想继续写出来。”次年五月，翦老自重庆至上海，生活困难，不久又为病魔所缠，一度汤水不进；可是他还是伏在地板上坚持写作，并完成了《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》一文，并于当年的十月，发表于上海《中华论坛》，基本上表达了他原定的第三篇内容的想法。此后，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加剧进行，上海的斗争也日益尖锐。由于斗争的需要，翦老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转移到香港，次年十一月又奉命由海道经山东，到达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。一九四九年二月，又随军来到北京。在生活多变的情况下，原定的第二篇文章一直未能撰写。一九五四年春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“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”，展品中有古人类化石，有其他文物约三千七百余件，其中有石器、骨器、陶器、青铜器、漆器、瓷器、玉器、金银琉璃器等，全部都是解放后的那几年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。翦老在饱览这批国宝之后，连夜写出《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》一文，于这年五月二十日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，对他的写作计划来说，稍稍偿还了他当年拟撰写的第二篇的宿愿。

我们这次整理本书，在原收三篇之外，又将上述两篇收入，借副翦老撰写本书之初衷。此外，还把他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在广西师范学院所做学术报告《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》一文的第二部分《关于历史学的“三基”问题》收入，刊于首篇。

“三基”和“四性”在十年动乱时期，曾是翦老的主要罪状之一。今时代昌明，再将此篇公之于众，我们相信既有益于史学学习、研究者之需要，亦可告慰翦老于地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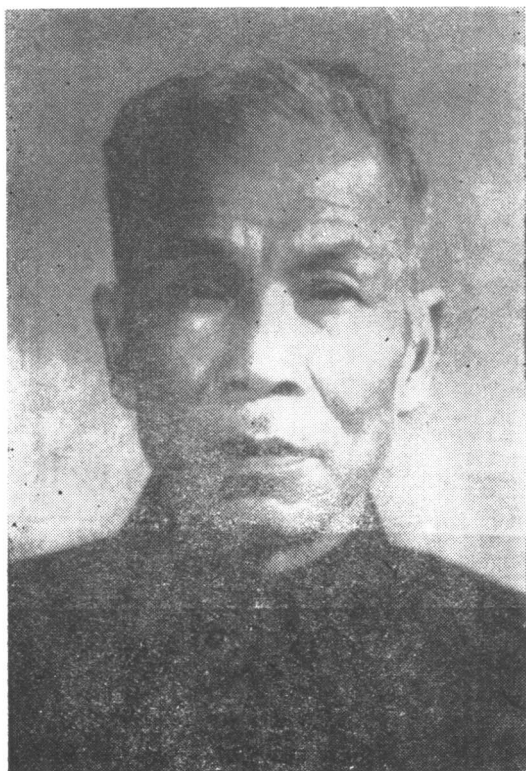
参加整理本书的同志有马植杰、刘华祝、何瑞田和我。全书各篇亦由我最后全面检校。整理本书的基本原则共有四条：一、理论、观点和文风一律不作改动；二、直接、间接引用的材料一一查对；三、根据横排的要求，重新标点；四、注意改正原本中的错别衍漏文字。

今天是翦老离开我们十六周年纪念日。我们整理出本书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以表缅怀之情。

张 传 玺

一九八四年

十二月十八日于燕园



翦伯赞同志

目 录

增订本序	1
关于历史学的“三基”问题	1
一 关于基本理论问题	1
二 关于基本知识问题	8
三 关于基本技能问题	11
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	14
一 导言	14
二 正史	17
三 正史以外的诸史	25
四 史部以外的群书一经、子、集	34
五 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	47
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	50
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	60
一 史料与方法	60
二 史料探源与目录学	61
三 史料择别与辨伪学	63
四 史料辨证与考据学	69
五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、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	74
论司马迁的历史学	81
一 司马迁的传略	81
二 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一——纪传体的开创	88
三 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二——纪传体的活用	96
四 司马迁的历史批判——“太史公曰”	102
五 余论一史料的搜集编制及其历史观	110

论刘知几的历史学	117
一 刘知几的传略	117
二 刘知几的著作、思想及其历史观	122
三 刘知几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	127
四 刘知几论纪传体的各部门	132
五 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	139
六 刘知几论历史学文献	148
七 余论	154

关于历史学的“三基”问题

我到桂林以后，听师范学院的老教师们谈到历史学的基本功问题。我觉得基本功是要学的，但这个提法不大全面，全面的提法还是要讲“三个基本”，即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。就我所知道，现在讲的基本功，主要的是讲如何读书，如何查字典，如何找材料，不包括基本理论在内。我这个人很喜欢讲话，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，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。现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，对理论不大注意了，因此，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，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。

一 关于基本理论问题

所谓理论，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没有这种理论去指导研究历史，是研究不好的。因此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，在今天，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和老师最主要的一个任务。如果马列主义没有学好，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，那很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。

对理论，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。不仅这一点，就是在历史科学本身来讲，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要。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，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；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时代，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；我们研究一个历史制度，就是替这个历史制度作总结；研究一个历史事件，就是替这个历史事件作总结。作总结不容易吧！我们搞了一年工作和教学，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。一年的历史都很难总结，那么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就更难了。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现代史来呀，解放以来的历

史，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？我看很难写出来，我也写不出来。那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，要不要理论呢？也要理论吧！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，要总结吧！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，也要总结吧！这些现代史、近代史、古代史，都要我们来作总结。整个的历史，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，重新加以研究。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？毛主席告诉我们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都要研究。我们打开二十四史，有许多历史人物，都要作总结。毛主席只是告诉我们，这些人要总结，要对他们进行研究，要给他们评价，也告诉我们如何研究，如何评价。但是，他没有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间成千上万的人，每个人都作出总结来。我们也不能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总结都依靠毛主席去做，我们坐享其成，这是不可能的；这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任务。对一个人要作出总结就很困难吧。大家在解放以来经过很多次运动，很多同志都曾经作过总结，对于一个人要作总结尚且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人作总结，如果没有理论能行吗？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，现在没有作出正确的说明，都需要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进行研究，来作总结。没有理论，就不能开步走。马克思讲，学自然科学的人，可以用显微镜看微生物，看细菌，也可以用化学反映药来识别。学历史的人，用显微镜不行，用化学反映药也不行。你把“秦始皇”这三个字放到显微镜底下看，那也看不出他这个人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。所以，研究历史科学，还是必须学好理论。

学理论不是那么简单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都是很困难的。孔夫子的学生就觉得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文章可以学得到，讲性命的讲天道的这些理论就不容易学到。理论的学习是比较困难的。

现在忽视理论学习的有这么三种情况：第一种情况，就是觉得我只要掌握了丰富的资料，不学理论，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。这很危险，恐怕至多只能做资料工作，不能做历史学家。退一步

说，就是收集资料也要理论的指导。什么资料是重要的，什么资料是次要的，什么资料是典型的，什么资料是非典型的，什么资料是真的，什么资料是假的，这也要理论的指导。所以不学会理论，连资料工作也做不好。学好了马克思主义，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料，而且那些真有用的资料就会在你的眼睛里边凸出来，那些次要的资料就会回避了。研究历史，一定要学好理论，从收集资料，研究资料到写成文章，写成书，都要资料，都要理论。没有正确的理论，只是史料的堆砌，怎能成为历史学家？当然，只学理论，没有历史知识，没有资料，只放空炮，那也不行。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搞历史不要资料，我们是说要重视史实，要掌握大量资料；但是，我们说，更要重视理论。在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研究资料，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。

第二种情况，就是有些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学不进去了，觉得这个东西难学；但是也懂得一些。凡是讲阶级关系，骂地主一顿就行了，以为这就是站稳了立场；讲到民族关系，骂汉族一顿就行了，以为这就会不犯大汉族主义了；讲到国际关系，作一点自我检讨就行了，因为中国古代的某些统治者曾把军队越过了今天中国的疆界。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。我曾经讲过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。一直到前年我写那篇《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》，又说过：我们很多同志连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都没有搞清楚，好象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。但是，主要矛盾不完全是基本矛盾；有些时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；有些时候，民族矛盾也会成为主要矛盾。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，也可以不是基本矛盾。对基本矛盾同主要矛盾，有些同志没有搞清楚。好象讲这一段历史，要不讲历史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，就丧失了立场，认为必须如此讲；纵然情况不是如此，也要这样讲。这就是简单化。

还有第三种情况，就是有些同志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学到的一些理论，认为自己学得差不多，可以不必再学了。现在是万事俱

备，只欠东风，只要找一点资料，那就可以成为最好的史学家了。这样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最近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，我有一个发言。我说，我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，包括共产党员在内，也没有学好，社会发展史都没有学好。如果有人要是说我这话讲得不对，我说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测验，或者举行一个考试，出几个题来考一下：何谓奴隶制度？何谓封建制度？何谓资本主义社会？它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？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能称为奴隶社会，不能称为封建社会，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。怎么样叫做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叫“萌芽”？只出一个题，请大家来答一下，我自己就不能及格。你们可能比我学得好一些，我看也很难得五分。的确，现在大学里面应该再好好地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。连社会发展的轮廓都没有搞清楚就去讲资本主义萌芽，参加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，我觉得是很危险的。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很差，并没有学好。

我们没有学好，表现在哪些地方？表现的地方很多。我为了检查《中国史纲要》的编写，写了几条要求，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。我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；但是，严格一点好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、概念化、表面化、简单化、片面化、现代化。我们要反对公式化，反对概念化，反对表面化，反对简单化，反对片面化，反对现代化。不要公式化，要条理分明，脉络贯通，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，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；不要概念化，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；不要表面化，要通过历史的现象，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，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，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；不要简单化，不要繁琐，不要堆砌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；不要片面化，要能分辨清楚主要、次要，有所侧重，既不片面的夸张，又要重点突出。还有现代化的问题，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。既不要现代化，又要为政治服务，这个行不行呢？是不是我们一为政治服务，就把历史

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代来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很多的历史剧，都有现代化的倾向，总是正面人物不像共产党员就像青年团员，甚至比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还要正确。因为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还要犯错误，而戏剧里面的正面人物是从来没有错误的。那怕他是汉朝的也好，唐朝的也好，宋朝的也好，明朝的也好，都比现在的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正确；而且他的阶级意识，比现在的无产阶级还要鲜明。现在的戏剧，有些就是这样。这些同志的动机很好，应该肯定。他就想要通过这些戏剧来给观众一种阶级教育。但是，他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列宁讲过一句话，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，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。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。离开了历史主义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。写历史也好，讲历史也好，写文章也好，写书也好，教书也好，写戏也好，是不是要贯彻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的精神呢？当然要贯彻。但是历史首先是科学性，第二就是革命性。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呢？有些同志说不能统一，如果要讲革命就不能讲科学；如果讲科学，就不能讲革命。我看，这个说法不对。我认为完全可以统一，就看你怎么样去统一。有一个时期，有很多教师同志要把今天的政策贯彻到古代历史里去。我们党提出一个什么口号、什么号召，就把这个口号、这个号召塞到古代史里去；提出一种什么政策，也就把这种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。好象古代的人就提出过这个口号、这种政策，就实行过这个口号、这种政策。我觉得这种办法太现实主义了，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！那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评论历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。你说那行不行？那样，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坏蛋？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他哪里能够拥护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呀？秦始皇、汉武帝都不拥护呀！至于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，都要求照万隆精神，这哪里行呀？万隆精神是今天提出来的。讲到少数民族，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大家庭；那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，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在阶级社会是个民族

牢狱，共产党来了才变成民族大家庭。

理论没有学好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、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。讲书的时候，先讲一堆史料，然后讲理论。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主席的话，做一个帽子，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，也不管这些话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还有人把理论变成历史学的标签，变成历史学的花边，变成资料的花边。马克思讲了一句最形象的话。他说，你要找一个雕刻家或画家的思想，一定要从颜色和大理石中间去找，不是从它的外面去找。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去画画，这是他的思想。画家的思想就表现在这个颜色里面。你离开了颜色，离开了这张画，到哪里去找画家的思想呢？雕刻家他雕出来这块大理石，他的思想就凝固在这块大理石里面；离开了大理石的雕刻，你到哪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？为什么过去的雕刻家不雕刻劳动人民，现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劳动人民？为什么过去的画家不画农民，现在的画家要画农民？这与雕刻家、画家的思想有关系。戏剧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剧本里面去找。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，要写这些题材，而不写那些题材？又为什么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，而不把另外的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？这就是他的思想。一个历史家，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？对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？这就是你的思想。要在你叙述这件事、这个人的过程中间去理解你的思想。你的思想要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，而不要摆在叙述的外边。不要讲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，再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；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、恩格斯、毛主席的话，然后再把自己的话、把材料摆出来。这样材料是材料，理论是理论，材料与观点分家，而不是材料和观点统一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是非常困难的。这要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。

政策同理论要统一，并不是说要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。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

的，如果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那就要犯错误。但是，它还要根据国家和民族的革命的现实、当时的条件、民族的特点等等具体的东西，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制定的。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，政策是带有具体性的。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就应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。但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政策可以不同。政策是有地点、时间的限制。在古代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，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政策。同一个王朝，前一个皇帝和后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；同一个皇帝，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。比如说汉朝，在汉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“和亲”政策，就是同匈奴人“和亲”。到了汉武帝时候，变成了战争政策，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。到汉元帝的时候，又回到了“和亲”政策，因此，我们恭维王昭君。王昭君出塞是在公元前三十三年。她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到匈奴去，匈奴人最喜欢她。我前年到内蒙古，到处都见有王昭君的坟墓，每一个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家乡。直到现在，内蒙古的人民还都很喜欢她。这说明了西汉的民族政策也是有时间性的。我们不能强迫前一个皇帝来接受后一个皇帝的政策，也不能强迫前一个王朝来接受后一个王朝的政策，更不能强迫一个奴隶社会的王朝来接受封建王朝的政策，也不能强迫一个封建王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。用这样的办法古为今用，用这样的办法让历史为政策服务，就帮了倒忙。我们要真正做到让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，那就不是仅仅用某几个历史人物来服务，也不是用某几桩历史事件来服务，而是要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、阶级斗争的经验，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性，用这样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性或历史的倾向性来为政治服务。例如，我们能够指出，历史一定要使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，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件事，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件事。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历史研究，宣传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，宣传社会主义社

会、共产主义社会出现、成功、胜利的必然性。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就加以发展，坏的经验就引以为戒，不要重复。用这样的方法为政治服务，这才是真正的服务。现在有很多戏剧家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。卧薪尝胆可以为政治服务，我们现在要刻苦耐劳，建设社会主义。但是，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践说成一个那样了不起的英雄。越王勾践是不是个英雄？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，是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原则而战？我看他是打起一个复仇的旗帜，并不是为着一个新的原则而战。何况他还曾带着他的王后，带着他的大臣，带着他整个的国家，奴颜婢膝地接受吴国的屈辱。这种帝王我们也要跟他学呀？越王勾践有些地方可以学，他的刻苦耐劳可以学。但不能因为他刻苦耐劳，他那个奴颜婢膝也变成好的了；当然也不能因为他奴颜婢膝去接受屈辱，他的刻苦耐劳都变成坏的。这个还是要分别来讲。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历史人物绝对化了，一好就全好，一坏就全坏。当然写戏一定要有正面人物，还要有个反面人物。那么就尽量地把正面人物写得好一些，也必须尽量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丑一些，就是要典型化。戏剧上是允许艺术夸张的。但是，夸张也要有个限度，夸张到什么程度，就再不要向前进了，应当研究。

二 关于基本知识问题

基本知识包括掌握基本的资料。资料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学历史如果不掌握资料，光有理论，那是不行的。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讲过，历史家有三长：才、学、识。没有资料光有理论，从理论到理论，从抽象到抽象，从概念到概念，从结论到结论，那是讲空话。恩格斯讲，专靠几句空话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，一定要掌握资料。我们要反对轻视资料。有一个时期，有这么一个提法：史料即史学。史料就等于历史，这是错的。研究历史要有史料，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。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，但是砖瓦